



# 經濟成長何以無感

本文的目的在討論導致國人對經濟成長無感的原因，可區分為與物價相關者，以及與物價無關者兩類。其中與物價無關之因素包括所得分配惡化、勞動份額下降，以及固定資本消耗侵蝕成長果實三者；另與物價相關者則包括低薪與低價形成惡性循環、貿易條件惡化損及國民福祉，以及物價走勢歧異<sup>1</sup>三項因素。

許嘉棟（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 壹、前言

臺灣的經濟成長率自 1990 年代起逐漸下滑。在 1980 年代（1980 至 1989 年）的平均成長率為 8.48%，90 年代降至 6.63%，2000 至 2009 年與 2010 至 2017 年更進一步分別下降至 3.81% 與 3.47%，2000 至 2017 年的平均值為 3.66%。

與 1952 至 1979 年曾創下年平均成長率 9.87% 之佳績相比，臺灣所曾擁有的「亞洲四小龍」光環，早已不復可見。以美元衡量的平均每人國民所

得，自 2004 年起即落於韓國之後，更使國人難掩失落感。又 2000 至 2017 年雖仍有 3.66% 的平均成長率，但大多數國人並未明確感受到實際生活水準與福祉有所提高，故懷疑經濟成長的果實到哪裡去了，甚至進而質疑國民所得統計的可靠性；此即近幾年來存在於國內的「對經濟成長無感」問題。

事實上，2000 至 2017 年平均 3.66% 的經濟成長率使 2017 年的實質 GDP 比 1999 年增加了 89.5%；在扣除人口增加的因素後，仍然使平

均每人 GDP 的名目值由 1999 年的新臺幣 44.6 萬元增加至 2017 年的 74.1 萬元；同期間以 2011 年為參考年的平均每人實質 GDP，亦由 39.2 萬元上升至 69.3 萬元；增加幅度各達 66.1% 與 76.8%<sup>2</sup>。七成七的每人實質 GDP 增幅，照道理應有顯著提高國人生活水準與福祉的作用，國人何以會對成長無感呢？以下即分就非物價與物價因素說明。

## 貳、導致對成長無感的非物價因素

這方面的因素，主要有下列三項：

## 一、所得分配 M 型化

在全球化下，企業與資本的跨境移動性大幅提高，比勞動者有較多逐利機會；知識經濟之發展有利專業者，不利

一般勞動者；技術進步之型態多偏向非勞動密集；各國政府為了鼓勵投資，租稅政策多偏向對資本所得減稅；低利率的寬鬆貨幣政策也有利於取得資金、擅長金融操作者快速致富。以上因素共同造成了各國（包括臺灣）所得與財富分配的惡

化，形成 M 型社會。經濟成長果實，也因而多由原本所得就較高的資本主、具特殊高端專業知識的專業人士，以及擅於金融操作者等享用；人數越來越多、處於所得分配中、低階層的家戶或民衆，所能分享到的相對有限。

依據全球財富及所得資料庫，臺灣所得最高 10%、5% 與 1% 者所得占比之變化，如表 1 所示。這些數值是由中央研究院朱敬一與胡勝正兩位院士及其研究團隊，利用財政部財稅資料計算而得。同一研究也算得臺灣所得分配二十分位差距倍數（即最高 5% 者與最低 5% 者所得之倍數）之變化如圖 1。表 1 與圖 1 清楚顯示在 1981 至 2010 年期間，臺灣的家戶所得分配的確有趨於惡化、往高所得群集中的 M 型現象；惟此一現象自 2010 年以來已暫獲緩和<sup>3</sup>。

## 二、勞動份額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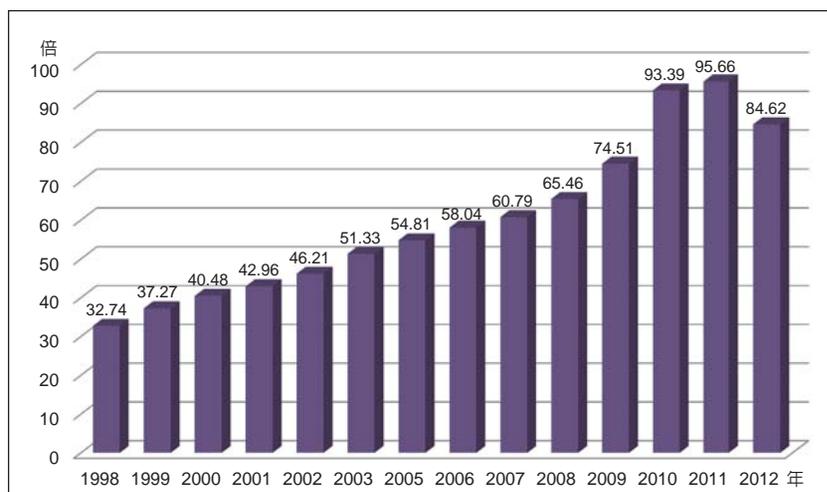
由於臺灣的經濟發展越來越偏向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以致受僱人員報酬占 GDP 比重（簡稱勞動份額）逐漸下滑。

表 1 臺灣高所得者所得占比

單位：%			
年度	前 10%	前 5%	前 1%
1981	23.64	15.63	5.93
2000	31.29	21.37	8.85
2010	36.40	25.58	11.20
2013	36.39	25.25	10.68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2016 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2017 年 10 月，頁 165）。

圖 1 二十分位差距倍數



資料來源：天下雜誌（2014 年 6 月），朱敬一「臺灣所得分配惡化隱藏不了」。

# 論述》專論 · 評述

行政院主計總處的國民所得統計顯示，臺灣的勞動份額在 1990 年達到 51.04% 的最高峰後，呈現近乎逐年下降的趨勢，至 2016 年降至 43.81%，跌幅達 7.23 個百分點；營業盈餘占 GDP 比率在同期間則相對地由 29.80% 逐漸攀升至 35.00%，增幅為 5.20 個百分點（圖 2）。此二比率的變化，意指勞動所得者所享受到的國民生產果實在下降中，而資本主之享用比率則上升。這自然使主要仰賴勞動所得維生者難以感受到經濟成長的好處。

## 三、固定資本消耗侵蝕成長果實

臺灣自 1990 年代起大力發展資訊電子等高科技產業。此類產業屬資本密集產業，不僅須使用大量的資本財，而且技術與設備之更新迅速，故固定資本的消耗（即折舊）也極為可觀。從而，固定資本消耗占 GDP 的比率由 1990 年的 9.43% 快速上升至 2009 年的 17.45%，增加了 8.02 個百分點，然後才逐漸回落至 2016 年的 15.60%（圖 2）。

折舊是生產過程中的資本耗損。它是生產過程中附加價值的一部分，故被計入 GDP，但是它不會成為國人的可支用所得。因此，固定資本消耗占 GDP 的比率上升，也意謂經濟

成長的果實，在扣掉被折舊侵蝕之部分後，所剩下能真正讓國人享用的比率下降。與 1999 年的折舊占 GDP 比率 11.69% 相較，2009 年與 2016 年之占比各上升了 5.76 個百分點與 3.91 個百分點；此充分顯示 2000 年以來折舊比重的上揚，的確侵蝕了國人所能享受到的經濟成長果實。

## 參、導致對成長無感的物價因素

以下討論導致國人對成長無感的三項與物價相關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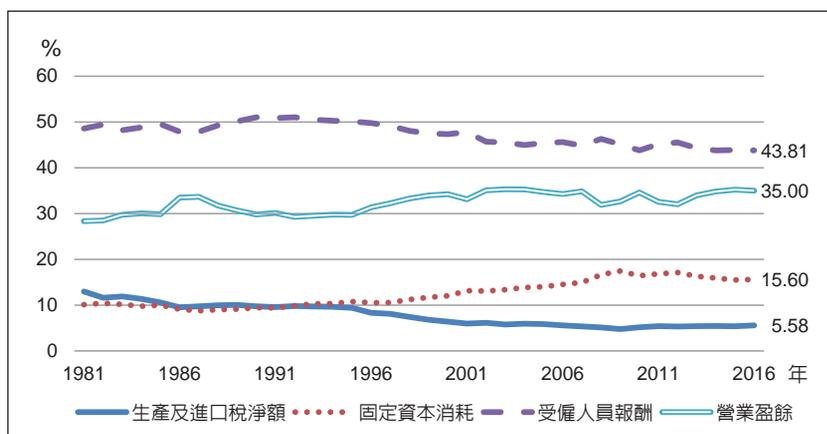
### 一、低薪與低價形成惡性循環

實質薪資停滯是國人，尤其是受薪階級，對成長無感的首號埋怨。在 1991 至 2000 年間，我國的實質薪資年增率尚達 2.9%，在 2001 至 2016 年期間，則下降至零。

國內實質薪資陷於停滯，主要是受到以下兩項因素之影響：

- （一）國內投資環境欠佳，導致民間投資意願不振、

圖 2 GDP 之分配比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國民所得統計」。

產業外移、對外直接投資盛行，以及外資對來臺直接投資不感興趣。其結果是國內資本累積緩慢，進而使得勞動需求疲弱，以及勞動價格（即實質薪資）難以提升。

（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緩慢，欠缺提升勞動生產力之技術進步，再加上企業普遍以降低成本（cost down）的方式因應來自國內外的競爭壓力。這些都抑制了勞動薪資的成長。

在薪資不漲的情況下，受薪階級對物價極為敏感。復以所得分配惡化，助長了社會上的反商仇富心理。二者導致多數國人與媒體，對任何商品或服務價格的上調，不論其原因為何，多大加撻伐，強烈反對。

此種社會氛圍，使得民間業者不敢輕言漲價。又政府即使基於反映成本、減少民衆浪費，或節能減碳等正當理由，對健保以及水電、交通運輸等公用事業，也不敢輕易提高收費。意即：低薪導致了價格的

凍漲。

價格凍漲所形成的低價，雖然使物價保持穩定，民衆在薪資難漲下的生活水準亦得以維持，但是價廉也意指利薄，業者不得不以擲節成本（cost down）因應，包括嚴控勞動成本，以致薪資更難上升，進而形成低薪與低價的惡性循環。而且，利薄也使業者沒有能力，亦欠缺意願進行投資，終至損及經濟成長、就業及薪資水準。

## 二、貿易條件惡化降低國民福祉

出口與進口占我國 GDP 的比率，近十多年來分別都在六成與五成以上，故出口與進口價格的變化對實質國民所得與國民福祉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在我國實質國民所得的估算上，乃有占比亦具相當重要性的「貿易條件變動損益」一項。

所謂貿易條件，是指本國一單位出口品所能換到的進口品數量；在實際統計作業上，是以輸出物價指數除以輸入物價指數衡量之。當輸出物價相對於輸入物價上漲（下降），

此謂之貿易條件改善（惡化）；它有提高（降低）實質國民所得與國民福祉的作用，在國民所得統計上，即呈現為對外貿易條件變動利益（損失）之數值。

下頁圖 3 顯示臺灣的貿易條件自 1998 年起呈現逐漸惡化趨勢，至 2013 年才反轉改善；但 2017 年之貿易條件只與 2009 年相近。其所產生的貿易條件變動損益占 GDP 比例，在圖中呈現與貿易條件類似的走勢。若將實質 GDP 與貿易條件變動損益予以相加，並稱之為「加計貿易條件變動損益後之 GDP」，其平均年成長率在 2000 至 2012 年（2017）期間只達 2.47%（2.80%），比實質 GDP 的平均成長率 4.20%（3.66%）縮小了 1.73（0.86）個百分點，縮小幅度超過四成（二成）。

爲了進一步估算此段期間貿易條件惡化對國民福祉之影響程度，將循以下程序，估算 2012 年與 2017 年以 1999 年貿易條件爲基準，所衡量的貿易條件惡化損失占該年實質 GDP 之比例：

# 論述》專論 · 評述

1. 以 1999 年的貿易條件為基準（即將該年的輸出與輸入價格指數，以及貿易條件指數皆設定為 100），計算貿易條件惡化至最低點的 2012 年與最近的 2017 年之貿易條件惡化損失<sup>4</sup>；
2. 將之乘以 1999 年的 GDP 平減指數（PGDP），再除以各該兩年的 PGDP，求得 2012 與 2017 這兩年以參考年（目前的國民所得統計以 2011 年為參考年）價格衡量的貿易條件惡化損失金額；
3. 將此損失金額除以該年的實質 GDP。

依此程序所算得 2012 年與 2017 年貿易條件惡化損失，各占該年實質 GDP 高達 26.61% 與 18.25%。此二數據充分顯示貿易條件在此期間的惡化，顯著降低了國人的經濟福祉。

此外，貿易條件 = 輸出物價 / 輸入物價 = 出口品的國內新臺幣價格 / （進口品的外幣價格 / 新臺幣名目有效匯率）

式中的新臺幣名目有效匯率所衡量的是新臺幣的對外價值，即一單位新臺幣所能換得

外幣的數量。根據此式，當新臺幣對外價值下跌，即名目有效匯率下滑時，貿易條件將惡化，進而產生貿易條件變動損失。圖 3 顯示新臺幣名目有效匯率指數在 2000 至 2009 年期間大抵呈現下跌走勢（即新臺幣走貶），隨後自 2010 年起逐漸反轉上升。據此，吾人可推斷：新臺幣在此期間走貶，應與臺灣貿易條件的惡化難脫關係<sup>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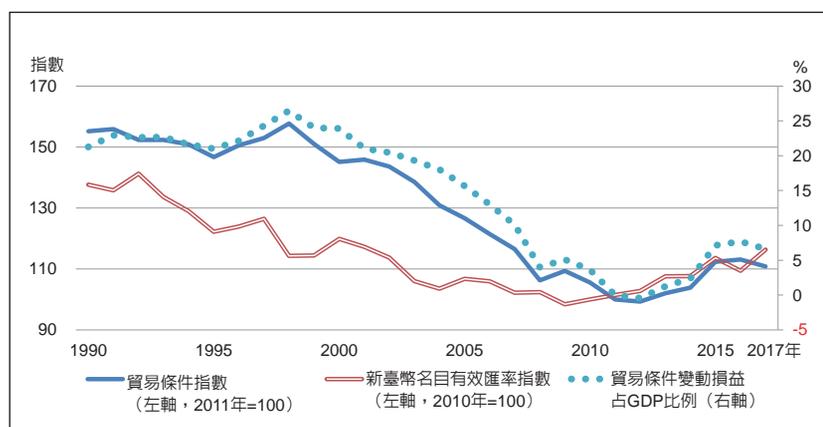
### 三、物價走勢歧異

經濟成長率所衡量的是實質 GDP 的成長率，而實質 GDP 是將以當期價格計價的名目 GDP 除以 GDP 平減指數（PGDP）計算而得，故 PGDP

若上升（下降），經濟成長率（即實質 GDP 成長率）即會低於（高於）名目 GDP 的成長率。然而，與民衆的消費能力相關，直接影響國人在日常生活消費上所獲得的國民福祉之物價，主要是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因此，若是 PGDP 與 CPI 的走勢並不相同，就會使得經濟成長率與國民福祉或生活水準之提升度產生差距。

下頁圖 4 顯示 PGDP 在 2000 至 2011 年期間近乎逐年下滑，然後自 2012 年起逐漸上升，2017 年的 PGDP 回升至與 2007 年相當之水準；而 CPI 則大致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由於 2017 年的 PGDP 比 1999

圖 3 貿易條件、新臺幣名目有效匯率指數與貿易條件變動損益占 GDP 比例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BIS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年為低，故名目 GDP 由 1999 年的新臺幣 98,156 億元增加至 2017 年 174,447 億元，成長了 77.7%，而同期間以 2011 年為參考年的實質 GDP 則由新臺幣 86,168 億元擴增至 163,292 億元，增幅達 89.5%，高於名目 GDP 的成長幅度。但是，若將名目 GDP 以 CPI（同樣以 2011 年為基期）平減，所算得以 CPI 衡量的 GDP 實質購買力，則由 1999 年的 110,648 億元增加至 2017 年的 164,962 億，只成長了 49.1%，遠低於實質 GDP 之增幅 89.5%。因此，CPI 與 PGDP 的走勢歧異，前者之漲幅顯著超過 PGDP，也是導致國人難以感受到經濟成長之好處的原因之一。

此外，民衆對所得之支用，除了日常生活的開支之外，還有購買住宅等資本性用途，因此民衆除了關心 CPI 的漲幅，擬購屋者也很關切房價的上漲。2009 年以來國內房價的飆漲，遠超過絕大多數國人所得的增幅，其所造成的已是嚴重民怨，而不單純只是對成長無感而已。本文對此不予贅述。

#### 肆、結語

臺灣在 2000 至 2017 年期間，年平均經濟成長率仍有 3.66% 的水準，但是國人對此經濟成長率普遍並未感受到有明顯提高其生活水準與經濟福祉的作用。本文的目的在討論一些導致國人對經濟成長無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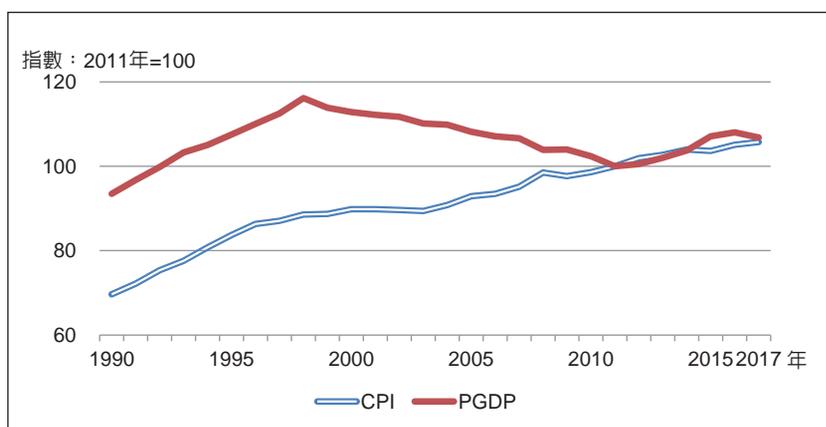
的主要因素。本文指出主要導因中，與物價相關者有三項，與物價無關者亦有三項。

本文只討論國人對經濟成長無感的原因，不進一步探討這些成因應如何面對、處理。事實上，這些成因的背後，多有其更深層的導因；欲求改善，並非易事，故謹將之留待方家。

#### 註釋

1. 許嘉棟，「經濟成長無感有理」，工商時報 A6 版（2017 年 7 月 13 日）一文，曾提及幾項導致國人對經濟成長無感的原因。本文將該文予以改寫，並予擴充。
2. 平均每人實質 GDP 的增幅高於名目 GDP，係因 2017 年的 GDP 平減指數低於 1999 年。又 1999 年的國民所得平減指數高於 2011 年，故 1999 年的實質 GDP 低於名目 GDP。此可參見圖 4。
3. 行政院主計總處的家庭收支調查所算得的戶數五等分位所得倍數，以及基尼係數，也顯示類似的變化趨勢。
4. 行政院主計總處的國民所得統計年報附錄，附有貿易條件變動損益如何估算的說明。
5. 中央銀行一直否認新臺幣名目有效匯率是影響臺灣的貿易條件之因素。此一問題值得國內學者研究。❖

圖 4 CPI 與 PGDP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